

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 要)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廣 州 日 報 編 輯 部

《文艺报》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很能解决当前思想和创作的实际，请示中央可否发表。华主席批示同意，说文章很好，请胡耀邦同志阅处。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和宣传战线司局长以上干部见面会上讲：《文艺报》作了一件好事，找出来周总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展。还是先在《文艺报》发表，三月份刊出，发表前先组织学习，作出准备。

《文艺报》已就此作了布置。

广州日报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

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 要)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引 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不能要求任何人都这样。任何人都可能想得、说得、做得偏一些，但是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对立面的统一。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是领导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

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毛主席经常说，我们看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都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

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何况是个人的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的范围内讨论的，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作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里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

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最好的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

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们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有阶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

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都是从主观上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所以，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当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主要是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有的是大框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使之无产阶级化，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来比较，那些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

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妨碍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抓住这种辫子，加以扫除，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扫除。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或者已经判明是敌我矛盾而还把他留在内部，也要给他一个帽子诸如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这种帽子还是要戴的，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都当作毒草、邪道。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

系出身历史，应当戴的帽子也不戴，应当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向党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改不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当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气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一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

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对于精神生产者是个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教工作方面我有两个错误，一个是办高等教育，一个是办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注：一百零三部是一九五八年艺术片的总产量，其中包括故事片与纪录性艺术片。——摘录者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杰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

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求得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当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当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得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

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归公了谁的稿费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当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首先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当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允许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是精

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生活，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所以同样要规划一下。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

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上的，思想上的，习惯上的。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

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全国农村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城市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同其家属，约有四五千万人，或者更多些。在这些入当中，搞政治破坏、政治报复、复辟的，从反对到行动的，是少数，是最坏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第二，是思想上的。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我们的脑子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尤其对于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其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

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上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分子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还是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改造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胚胎中来的新社会，那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第三，是习惯势力。一种是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另一种是新社会出现的习惯势力，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